

论关仁山小说的乡贤叙事及意义

杨超高

内容提要 在当代作家中,关仁山是在叙写乡贤上用力最多的一位。他通过一系列的小说创作,改写了现当代文学对乡绅、乡贤的叙事范式,重塑了一批血肉丰满的当代乡贤形象,又在继承乡贤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加以革新,重建当代乡贤文化。在重塑与重建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作者的乡贤标准和乡村态度。无论是就乡村文化建设,或是就文学本身而言,关仁山小说的乡贤叙事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关仁山 乡贤形象 乡贤文化 《天高地厚》《日头》《麦河》

杨超高,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510632

关仁山是一位坚持乡土书写的作家。自九十年代以来,关仁山先后发表了《苦雪》《太阳滩》《红旱船》《蓝脉》《风潮如诉》《海眼》《醉鼓》《闰年灯》《红雀东南飞》《太极地》《落魄天》《胭脂地》《裸岸》《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破产》《天壤》《平原上的舞蹈》《红月亮照常升起》等中短篇小说,又相继出版了《天高地厚》《白纸门》《麦河》《日头》等鸿篇巨著。在这二十多年来,关仁山深切地关注乡村的变革,跟踪记录下农村生态与农民心态。他对于乡村与农民有一份朴素而真挚的热爱,这份热爱,既表现为数十年如一日的关注,更表现在他重建乡村的愿望上:他以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重塑乡贤形象,重建乡贤文化。

一、乡贤形象的三种类型

乡贤,是指“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1]。总体而言,在关仁山的笔下,乡贤形象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传统仁义的卫护者。这在“雪莲湾”系列小说中有较明显的表现。在《苦雪》中,出自打海狗世家的“滚冰王”老扁,遵从祖上的规矩,“不设诱饵,不挖暗洞,不用火枪,就靠自个儿身上那把子力气和脑袋的机灵劲儿”,在与海狗的公平较量中显出尊严与名声。在《醉鼓》中,最后一个鼓王老

本文为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贤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6ZDA192)阶段性成果。

[1]《汉语大词典》(第10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年版,第670页。

鼓凭良心行事,悉数上交赌徒藏匿的四万元赌资,他的人格力量,恰如六角木鼓一样催人醒催人正。在《海眼》中,疙瘩爷在“海坏了”之后四处奔走,拼死拦截藻王,他守护的既是“一介神物”红藻,也是世间的正义与良心。《裸岸》与《白纸门》中大写的七奶奶,更是传统道德的化身。她为修建学校而替村里外出催债;当村子发生蟹乱,七奶奶更是化作一扇“大义凛然、勇敢忠贞”的“雷震枣木”门板,化解了一场灾难。

从“海上”到“平原”,关仁山“平原系列”小说——《天高地厚》《麦河》《日头》也塑造了不少品德高尚的乡贤形象,如白立国、老轸头、杜柏儒等。在小说《麦河》中,瞎子白立国仁义忠厚,他拯救失足的桃儿,告诫迷失的曹双羊。他心地善良,对乡邻充满关心,数次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他与乡亲们来往中,有一种人情,一种心心相印的优美人情”^[1];他为人刚正,面对土地流失、乡村污染等问题,他能够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正如他守望麦田、守护土地一样,他也是道德的守护者。

卫护传统道德的不止于“老人”,也有一批“新人”。诸如韩成贵(《天壤》),九月、杨双根(《九月还乡》),金沐灶(《日头》)等人,他们承继了面临失守困境的道德传统。韩成贵兑现租借土地的诺言,让推土机铲掉大片即将收割的庄稼。杨双根帮助五奶奶,宽容并救济田凤兰,为了村人的集体利益开辟荒地,他甚至误入犯罪的道路。从城里还乡的九月,拿出10万存款并以身体为代价,换回了被开发商占着的八百亩土地。金沐灶更为典型。他为人仁厚,收养了大嘴吃尸液的孩子,并最终与有所醒悟的权国金和解。金沐灶更可贵品质是他的正义与良知,他把重建象征着日头村文脉的魁星阁作为毕生事业,同时,他抗议世间所有的不公、不仁、不义,并与之抗争。

二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这主要是指一些能够为乡民利益发声,并有所作为的正义廉洁的乡村干部,典型如《天高地厚》中的梁恩华与《日头》中的金沐灶。他们不仅有很强的个人操守,并且能够以其特殊身份来维护乡民权益,捍卫乡间正义,因而具有明显的乡贤特征。然而,与荣汉俊、权桑麻不同,梁恩华与金沐灶在乡里所确立的威信与声望,并非凭借政治权力而获得,而主要来自于自身的道德力量与人格魅力。蝙蝠乡乡长梁恩华唯才是用,不惜压下呼声很高但没能力带领蝙蝠村致富的亲哥哥梁罗锅,而力保“毛病不少”却能干的荣汉俊。他关心群众疾苦,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提出“借地于民”的想法;当钢铁厂糟蹋了稻田时,梁恩华安抚鲍三爷等农民的情绪,提出打药灭虫与补种大豆的补救措施,将农民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并一直在为农民追讨六十万元的赔偿款;同时,在轧钢厂整治过程中,梁恩华又积极为家庭困难的女工讨要被拖欠的工资。梁恩华不仅在道德良心上极为自律,在官场职责上也有所作为。他跑遍乡里所有企业进行摸底,并积极推行股份制改革,盘活了乡村企业的发展,也一并解决了许多连带的问题。

金沐灶也曾当过一段时间的副乡长,他正是鲁迅笔下“为民请命的人”。他在任期间,常在农村蹲点,指导村民建立农民合作社、种大棚蔬菜;为了打响日头村大米的品牌,金沐灶带领村民一起进城推销。不仅如此,他为了乡里的经济发展以及更多人可以就业,置个人恩怨不顾,出面拉拢袁三定投资披霞山铁矿开发;而当金沐灶知道铁矿厂污染严重,他找到袁三定据理力争,逼迫矿上同意采取补救措施。及至披霞山铁矿事件爆发,金沐灶怒骂权桑麻,并且最终揭露了事件的真相。作为乡村干部,他没有因为进入官场而变成“聪明人”,而坚守“我是农民”的本色与“副乡长”的担当。

三是农村发展的领路者。这主要指那些能够致力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乡村能人。王先明认为,在乡村民众的心中,通常把“拥有某种技能的社会成员看做‘乡村能人’”。他们“与有一定家世、文化权威、道德威望支持的‘人格魅力’型社区精英相比,其支配地位、有限声誉的获得主要归功于个人的某

[1]关仁山:《乡村变革给我激情——谈长篇小说〈麦河〉创作》,〔北京〕《人民日报》2011年1月24日第025版。

种‘能力’”^[1]。乡村能人更侧重他们的能力属性,而并不一定具有足够的道德感,比如以荣汉俊与权桑麻为代表的第一批弄潮者。荣汉俊从假冒伪劣的皮包厂发家,继而又办起红星轧钢厂;权桑麻凭借权力与资本,不仅在日头村建立了一个“钢铁王国”,更缔造了一个“农民帝国”。不可否认,他们富于胆识与魄力,对农村发展有很大贡献,但他们在个人道德方面也存在着缺陷。

将乡村能人的能力与个人道德和乡土情感相加,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乡贤形象,也就是关仁山笔下的陶立(《红月亮照常升起》)、鲍真、梁炜(《天高地厚》)以及曹双羊(《麦河》)等人物,他们兼具有道德感以及引领乡村发展的愿望和能力。其中,鲍真就是一个集智慧、勤劳、坚韧、正直、善良于一身的人物。她自城里还乡,并扎根在乡村与土地之上,先后开垦荒地、办酱菜厂,又通过土地转包的方式开始农业规模经营,最后转向生态示范田。在一番努力下,终于创造了她的“红苹果”品牌。

如果说鲍真走的路主要是通向个人抱负的实现,那么,《麦河》中“麦河集团”创始人曹双羊就有更明显的造福乡里的意味。如他说:“宁可赔钱,不做恶事,宁可失败,绝不离开土地!我得带着乡亲们一块儿过好日子,一块儿往前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曹双羊是一个形象单一的人物,相反,曹双羊身上交织着爱与恨、善与恶,他前后在“一无所有”的颓废绝望以及“无所不有”的精神空虚中两度迷失,又通过两次深刻的反省与痛苦的蜕变救赎了自己的灵魂。从迷信金钱、不择手段,到深刻地认识资本,以现代意识经营“麦河集团”,再到最后的回归土地,养护土地,造福桑梓,这正是他蜕变的历程。

可以说,在关仁山的小说中,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有传承古代乡贤传统的德高望重之辈,也有具有现代意识又心系乡土的乡村精英、领袖;有以身殉道者,也有正在“成长”的乡贤人物。他们在不同方面演绎着自己精彩动人的一面。而作者坚持不懈地塑造乡贤形象,也表达出他的乡贤立场和对乡村社会的冀望。作者说,“如果塑造不出更新的典型农民形象,突破和超越就是空谈”^[2]。因此,作者在乡贤形象塑造上苦心经营甚至孤注一掷,并注入了他深切的期望。他肯定乡贤的文化精神与道德力量,并肯定他们在乡村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如白立国、金沐灶、曹双羊等人。他们是乡里有德行的人,他们在维系乡村关系、凝聚乡村情感和引领乡村发展上有着无可替代的意义。

二、民间习俗与乡贤精神

作者曾说,“塑造英雄是呼唤英雄辈出的制度”^[3],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塑造乡贤也是为了建构乡贤的文化,二者不可分割。什么是乡贤文化?有学者论到,现代意义上的乡贤文化,“既包括古代乡贤留下的文物、文献、传说以及热爱乡土、关心乡村世道人心及维护乡村社会秩序、以德服人的优良传统和文化精神,又包含了现代乡村精英对传统乡贤精神的继承、践行与创新”^[4]。它既是乡贤身上体现出来的优秀的文化精神与道德传统,也是一种可以培育、激励现代乡贤的文化土壤。关仁山小说的乡贤叙事,不止于塑造乡贤形象,他还有意从民间的角度,挖掘出许多与乡贤相关、具有乡贤意义的故事传说(如《日头》中的“红嘴乌鸦”、《麦河》中关于“善庆”的传说)、民间习俗以及文物,并与小说中的乡贤形象塑造一起,重建乡贤文化。

首先,作者在诸多小说里注重表现一些民间节日、习俗、仪式,挖掘并弘扬其中的乡贤精神,又通过它们的兴衰浮沉来引起人们注意。事实上,乡贤文化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有着极大的关联,一些民间习俗、民间信仰中就蕴含了乡贤文化的精神要义。民间习俗能够在深层次里反映出民众的集体愿

[1]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页。

[2]关仁山:《春天来了,我们在土地上播种》,〔北京〕《文艺报》2012年10月26日第005版。

[3]关仁山:《农村现实题材创作的机遇和挑战》,〔北京〕《中国艺术报》2006年7月21日第003版。

[4]季中扬、胡燕:《当代乡村建设中乡贤文化自觉与践行路径》,〔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望,而对它们的传承与遗弃又能见出人们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如醉鼓节、龙帆节、海藻节、雪灯会等民间节日,它们在小说中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寓意,即迎正镇邪,守护世道人心。在小说《醉鼓》中,醉鼓节起源于老鼓的先人奎安。奎安是滦州府上打鼓的好把式,为了替含冤女子伸张正义,他两次冒着被杀头的危险私自击鼓,最终被老爷砍掉一只左手,发落到雪莲湾。醉鼓象征着人间正义,它“蔑视金钱和权贵,催人醒催人正”,醉鼓节正是对这种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只是,留传下来的醉鼓却被“富贵牌松花蛋”冠名,与此相应,龙帆节、海藻节、雪灯会等民间节日也面临相似的困境。海藻节寓意着渔人对大海的感恩,可“近几个闰年海藻节断了,各出各的海,各做各的梦,捞钱都捞疯了,没人想着红藻”(《海眼》);代表正直、信义以及福气的雪灯会,“早已让金钱把它从民俗中异化出来”(《闰年灯》)。

除了民间节日,作者还写到其他的民间习俗,最典型的是“白纸门”:

白纸门的习俗唯雪莲湾独有。……雪莲湾人喜欢白门,是有渊源的,他们认为白色象征纯洁,在纯洁的底色上再配上门神,门神的颜色各异,就真正起到避邪的意思。另外,还源于古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男女去世,摘左右扇门下葬就是这个理想的延伸。白门与月亮同色,他们在渔民心中构成平安治世图。面对着白纸门,意味着一生要正直、坦荡和无私,也意味着生活的情感。(《白纸门》)

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白纸门也承载着积极的精神意义:“白纸门有镇邪的作用,也有映照灵魂和清理灵魂的功能。为了捍卫道德的纯洁性,人们必须同邪恶作斗争”。因之,麦兰子透过白纸门看见自己充满污垢的灵魂;化作“雷震枣木”门板的七奶奶,更是仁义的象征,她将白纸门精神推至极高的程度。

小说《麦河》也写到一些民间祭奠仪式。一般来说,祭奠活动往往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精神信仰与文化认同。在“小麦图腾”一节,曹双羊提议祭奠小麦。小麦祭奠有一套庄严的仪式:敲响钟声,曹双羊朗诵祭辞,白立国弹奏三弦,曹玉堂先后喊道“祭连安地神——”“祭奠小麦咯——”“全体跪拜!”“麦子!”当祭奠进入狂欢阶段,人们在麦田里跳起了代表“彼此祝福、问好”的麦子秧歌。与之相似,在“铸魂”一节,为了祭奠鸚鵡村祖先,曹双羊在麦河墓地中间修建一座“寻根铸魂碑”,也随之举办了一场寻根铸魂仪式。祭奠者在庄重、神圣的仪式中感受到一种崇高的乡土感情,甚至这种感情已经超越了祭奠本身,上升到精神抚慰的高度。其实,无论是祭奠小麦或是祖先,它的实质都是为了寻找自己的“根”,为了真正地回归到“乡”与“土”。

在习俗之外,作者也写到一些文物,阐发它们所蕴含的文化寓意,并通过对文物的留传与捍卫来表达出一定的价值立场。例如,《裸岸》与《麦河》都有写到圆鼎(大铁锅)。传说鼎是由黄帝始创,成为旌表勋绩的礼器。乾隆年间,铁匠世家麦家做了一个大铁锅镇邪,成为家族的护符。传到七爷这辈儿,正值“打鬼子”时期,七爷用大铁锅当作船帮助村人转移。后来七爷被抓进据点当伙夫,用大铁锅煮米粥,为了配合县大队的进攻计划,七爷偷偷在大铁锅里放毒,帮助县大队攻破了据点,而七爷却被鬼子放进大铁锅油炸了。及至“大跃进”时期,村里就剩这唯一的一口铁锅了。“大铁锅教育了几代人,喂养了几代人”。七奶奶对大铁锅的捍卫,也彰显她与铁锅同样的精神意义。然而,象征着正义、慈善的大铁锅,虽然被重新挖出来并当做“典型”,却更多地成为各级官员合谋升官的梯子。大铁锅最终被砸碎。《日头》中的状元槐、古钟、魁星阁也有相似的命运。状元槐是祖先栽下的,连着日头村的命脉;古钟与“醉鼓”相当,“钟声能给人警醒,给人安详”;魁星阁则蕴含了文状元金绍奎为民请命、为民除害的精神,族人为了纪念金绍奎,于是建造了魁星阁,它是日头村的文脉,“没了文脉,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要成为野蛮人啊!”与大铁锅的命运有所不同,《日头》更注重文物的保护及文物精神的重建。金沐灶将重建魁星阁当作毕生信念,穷极一生,耗尽心血,终于完成。

可以说,关仁山对民间习俗、文物及故事传说的书写,也是对乡贤文化的积极重建。因为它们是

生成于乡土的传统文化,或许其中也有一些不可取之处,但不能否认它们所蕴含的最核心的精神素质与价值取向,正是乡贤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从文化效果上说,在乡土社会中,它们以一种无形的方式,维系着和谐、亲善的乡村关系,又流露出相当动人的乡村情感,它们的精神也成为一种激励后人的文化力量,这正合乡贤文化的本意。实际上,奎安、金绍奎、七爷本身就是正义凛然的乡贤人物,因此,他们舍生取义的故事传说也是乡贤文化精神的高度浓缩。醉鼓节、白纸门、祭奠仪式以及古代乡贤留下的文物,虽是几种不同文化形式,但它们有着共同的精神指向:它们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或象征着正义与善良,或寄寓了和谐的期望,或表达出植根乡土、热爱乡土的情感;并且,它们还能够以自身的文化魅力与道德吸引力感召人们,并引导人们见贤思齐、崇德向善。

这些民间习俗、文物及故事传说,虽不直接写乡贤人物,却也是关仁山小说乡贤叙事的重要内容。首先,它们本身就包含了乡贤文化的重要精神,如道德感、正义感,因而成为一种屹立的精神象征。其次,在小说叙事中,它们参与乡贤形象的塑造。一方面,它们是乡贤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与文化环境,例如金绍奎与魁星阁的精神锻造了金沐灶的性格,奎安的故事与醉鼓节的价值取向也时刻提醒老鼓做一个正直可信的人;另一方面,后人往往是在对它们的传承、卫护中成为乡贤人物,七奶奶化身白纸门的悲壮一幕就是她乡贤演绎的高潮,曹双羊也是在回归乡土、祭奠先祖的过程中实现精神的蜕变。最后,传统习俗的衰败、珍贵文物的破坏以及人们对先贤故事的淡忘,也表现出乡贤文化传统的失守,并能引起我们的注意与思考,提示我们重建乡贤文化的迫切性。

但是,认真考究起来,重建乡贤文化并非是照搬照抄,而是在立足于乡村现实的前提下,吸取其中有益的精神内涵,毕竟“有些东西是陈腐的,应该抛弃的”^[1]。在小说中,作者非常重视对于那些具有乡贤意义的传统习俗、文物的书写,小说中的人物也表现出强烈的重建愿望,但遗憾的是,他们往往以失败告终。以一些习俗为例,老一辈人所重视的醉鼓节、海藻节、龙帆节、雪灯会虽然得以重办,但它们的精神意义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复归,反倒是尴尬收场。这或许是一种局限。然而,在《麦河》以及《日头》中,作者就明显地超越了这种局限。尤其是在小说《日头》中,作者赋予金沐灶以儒释道精神以及基督教的“爱”,因此,他在重建魁星阁时能够大胆变革,除了鼓励魁星精神,也融入了人间爱心,把《金刚经》和《圣经》一起放进了爱心塔。这就提醒我们,重建乡贤文化,不能只是“怀古”式的感伤凭吊,也不是完全照抄照搬,而必须在“古与今、传统与现实、文化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2],使其对当下乡村文化建设发挥有效的作用。

三、乡贤叙事的意义

如果说,一位作家持续地关注某一问题,那么,其中必然有某种心理愿望。关仁山小说的乡贤叙事也是如此,它并不是偶然为之,而是持续、热烈、饱含情感的创作。究其原因,这与作者的写作立场与创作理想有紧密的关系。

众所周知,关仁山的写作曾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其主要特征是强烈的现实参与意识。诚然,他直面当下农村变革现实,敏锐察觉到农村发展的问题和农民面临的困境。如他所说,“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向城镇化的现代文明的转向,将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是不可抗拒的,因而,它对传统文化及其道德心理的震撼也必将是强烈而持久的。”^[3]在作者看来,这种震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村社会中的传统道德、传统文化日渐衰败。“市场经济对农民其乐融融氛围的破坏”,“农民之间越来越隔

[1]关仁山:《对土地和农民的牵挂》,[深圳]《中外房地产导报》2001年第10期。

[2]王泉根:《中国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形态与上虞经验》,[北京]《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第4期。

[3]关仁山、张艳梅:《以文学之光照亮乡土中国——关仁山访谈录》,[济南]《百家评论》2014年第6期。

膜,道德水准在下降”^[1],因此,作者借助于乡贤与乡贤文化的力量,呼吁乡村道德与乡村文化的重建,并渴望回复到“在长期的农业文明中,农民聚族而居,相依相帮,温暖而闲适”^[2]式的乡村情感与关系。二是传统农民在现代化过程的艰难转型。保守、陈旧的思想文化观念,使中国传统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有许多不适,所以,作者也特别强调现代意识对当代农民的重要性。显然,关仁山小说的乡贤叙事就寄寓了他的深切希望,那就是呼唤更多具有乡贤精神与现代品格的新型农民出现,并渴望重建一种亲善和睦的乡村情感与关系。因此,作者不遗余力地塑造具有乡贤意义的新农民形象,并努力建构能够培植乡贤人物、维持乡村情感与关系的文化土壤。其实,关仁山想要做的,就是在日渐苍凉的乡土大地上浇灌出一片温厚的热土,并撒下新的种子,为了植出中国乡村新的希望来。

作者的用心就昭示了乡贤叙事的意义。首先,从现实角度来看,关仁山小说的乡贤叙事对于乡村文化建设,尤其是乡土情感凝聚与乡村伦理重建,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不难发现,当下乡村社会正面临许多问题:乡村社会精英流失,农村空心化、原子化,乡村人心涣散;在市场经济时代,“商业文化迅速进入农村并成为文化主导,传统乡村伦理受到了颠覆性的冲击”^[3]。面对这些问题,乡贤叙事可以发挥它的作用。当然,乡贤叙事与乡村文化建设不是同一个范畴,二者不能直接对应,但是,乡贤叙事可以以它特别的方式——通过乡贤人物的塑造、乡贤文化的建构,以间接的方式引起注意和思考,并实现文学的批判与引导作用,从而影响到现实乡村的文化建设。具体来说,它在乡土情感凝聚与乡村伦理重建上有较大意义。

一方面,乡贤叙事是一种富于情感与力量的叙事,乡贤文化在联结乡民关系、凝聚乡土情感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关仁山的小说中,作者竭尽所能地突显了乡贤人物的道德感,并加以渲染;也通过民间习俗、乡贤故事传说以及乡贤留下的文物表现出乡村文化中的崇高、美善一面,给人以心灵的洗涤;又有意呈现出其中的一些美与善的衰败过程,以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可以相信,这种包含人格魅力及文化感染力的乡贤叙事是蘸满情感又极具力量的,无论是感动或者感叹,它都能够增强乡村情感的凝聚,强化对乡土文化的认同。

另一方面,在乡村伦理秩序的维系上,乡贤及乡贤文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既是乡村伦理道德的推行者、维系者,又是一种可资借鉴的思想文化资源。秦晖甚至将古代乡村治理模式概括为“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实际上,当下乡村社会的伦理秩序也经受着巨大的冲击,并暴露出许多问题。关仁山的小说也直面了一些重要的伦理问题,如金钱物欲对人心的异化,导致道德败坏、生态恶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坏。与此相应,作者突出了乡贤人物的道德属性与乡贤文化的感染力量作为补救方法。一方面,作者通过乡贤人物来修复并维持乡村社会各种关系的“平衡”;另一方面,也通过对乡贤文化中诸如“善”“正”“和”等内容的强调,来引导乡村伦理的重建。

其次,从思想角度来看,关仁山小说的乡贤叙事肯定了乡贤的意义,并建立起一种新的乡贤标准与乡贤观。

乡贤叙事就意味着关仁山对于乡村建设的一种思考,即肯定乡贤群体及乡贤文化在当下乡村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也论到,“在传统社会,乡贤文化在宗族自治、民风淳化、伦理维系以及乡土认同等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宗族关系解体的现代社会,建构新型乡贤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固本培元有着重要意义。”^[4]乡贤叙事的思想意义也在于此。作者强调“用历史的和前瞻性眼光看待新农村

[1][2]关仁山:《对土地和农民的牵挂》,〔深圳〕《中外房地产导报》2001年第10期。

[3]贺仲明:《乡村伦理与乡土书写——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4]赵普光、李静:《当代文学对于乡贤文化的书写》,〔北京〕《人民日报》2016年8月9日第023版。

建设”^[1]，既要重视古代乡贤文化传统，又应该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因此，作者在继承传统乡贤文化的基础上加以革新，建立了一种新的乡贤标准与乡贤观。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可以看出作者在乡贤形象书写时，隐约流露出不同的情感与态度。其一，对于类似老扁、老鼓、疙瘩爷、七奶奶等传统型乡贤，作者的情感态度是以肯定为主又有所保留。一方面，作者感动并肯定他们身上的高尚情操，为了突显这种崇高道德，作者习惯于用一种“最后一个”的叙事模式，以引起足够的注意。另一方面，对于传统道德中保守、陈旧、狭隘的一面，作者明知不可取却又不忍批判，只在人物命运书写上委婉地表达出暧昧的态度。其二，作者在书写荣汉俊、权桑麻等一批人物时，同样缺少了明确的价值立场。正如这一代弄潮儿本身功过参半，作者欣赏他们的魄力、胆识，但又无法认同他们在道义与人格上的欠缺。其三，诸如鲍真、梁恩华、金沐灶、曹双羊等新型乡贤，他们是“一批植根农村，富有远见，掌握科学，敢于冒险的新农民”^[2]，他们体现出作者对于乡村出路的思考，也被寄寓了作者对于理想农民、乡村干部、乡村商人的全部希望，因此说，他们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乡贤形象。

由理想乡贤形象就可以推论出关仁山的乡贤标准。从作者对“邪”与“恶”的鞭挞、对正义的伸张、对仁善的赞美中可知，道德依然是作者强调的最重要的内容。在作者笔下，任何一个可亲可敬的人物，都有足够的道德感。在足够的道德支撑下，作者进一步地思考理想农民应有的品格。作者通过鲍真、金沐灶等“具有现代主体意识的新人”，强调了现代意识的重要性。相反，那种一味守旧的狭隘观念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比如坚持小农式种地的郭富九。此外，在荣汉俊、权桑麻与梁恩华、曹双羊等人物的比较之中，作者阐释了造福乡里的能力与愿望的辩证关系，这显示出他的另一标准：能够创造“资源”，并运用这种“资源”为民谋福祉。因此，对于乡贤而言，道德感是最核心的内容，现代意识是时代要求，造福乡里的能力与意愿是不可缺少的保证。这也就意味着，在作者心中最理想的乡贤形象应该是：有道德感与现代意识，有足够的能与强烈的意愿造福乡里的人。

最后，从文学角度来看，关仁山小说的乡贤叙事在人物形象塑造以及小说美学风格建立上也表现出了它的特别意义。

关仁山的小说以“大写”的方式，塑造了诸多理想的乡贤人物，为中国小说人物艺术长廊增添了一批具有时代特征、积极向上、色彩鲜艳的新的典型农民形象。如果把这些人物形象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农民以及对乡绅、乡贤的书写历史中考察，其意义就更为明显。他们以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展现出当代农民、新型乡贤的别样风采与魅力。

作者对乡贤形象的塑造，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积极建构的姿态，对于当下乡土小说而言，也不失为是一次美学风格上的纠偏，它为乡土小说创作吹来一股强健之风。可以说，面对当前乡村社会的巨大变迁，大多数乡土小说作家沉浸在失落感与迷茫感之中，他们的小说创作总体上弥漫着怀旧与感伤情绪。显然，关仁山在这些方面有所超越。他是一位兼具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的作家，对于乡村变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也有严肃的思考，甚至不无批判和揭露，但他更注意去表现光明和希望，并建立一种虔诚而崇高的乡土理想。作者说，“我们企盼给乡土以美好的环境，如果连理想都没有了，乡村还有什么希望？”^[3]正是因为这种积极乐观的创作态度，关仁山的小说呈现出一种特别的美学风格。

关仁山小说的乡贤叙事的意义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严格地说，它也有一些不足取的地方。在某

[1]关仁山：《农村现实题材创作的机遇和挑战》，〔北京〕《中国艺术报》2006年7月21日第003版。

[2]关仁山：《拓展新的文学空间》，〔北京〕《中国文化报》2001年5月10日第003版。

[3]孟繁华、关仁山：《现实精神与理想情怀——关仁山访谈录》，〔西安〕《小说评论》2012年第3期。

些小说中,关仁山对于乡贤的理解存在误区。也就是说,在怎样算是乡贤,如何成为乡贤这样的问题上,作者有时把握不够准确,甚至有自我冲突的地方。比如作者在《九月还乡》中用心塑造的九月。九月在城里有一段卖淫的经历,作者的本意是写一个“浪女回头”并在回归乡土后获得新生的故事,但作者却又将她推向一个十分不堪又难以收场的境地——她为了换回被开发商占据的八百亩荒地,不惜以身体为代价。愿望自然是高尚的,但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这不仅有悖于伦理道德,也有悖于作者塑造农村新女性的创作初衷。当然,在这向善与向“恶”之间本该有巨大的张力,如果书写得当,完全可以塑造出一个有深度的人物形象,但作者并没有展开足够的描写空间,对她当时应有的复杂的心理挣扎缺少足够的呈现,此后也缺少了必要的反思,甚至认为这一次别样的“卖身”行为,不仅没有脏了身体,反倒是洗涤了她的灵魂。显然,作者有些弄巧成拙。九月的妥协,多多少少让人感到有一种恶习的惯性在内,又似乎是被人抓住把柄之后的无可奈何。而且,在叙事逻辑上,九月是在“卖身”之后才生出对那片土地的深情,而不是因为热爱那片土地才答应这一笔身体与土地的交易。因此,作者想要表达的大义和崇高感就大打折扣了。

但“瑕”不能掩“瑜”,关仁山仍然是一位在乡贤书写上很有建功的作家。也许,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话作为此篇的结束语。他说:“文学,虽然不能够一一解决农民问题,但是,它应有的步骤和形式,以血肉丰满的农村新人艺术形象,向农民的生命意义、生存状态发出凝重的叩问和深情的呼唤。”^[1]自然,我们期待更多这样的文学。

[责任编辑:平 啸]

On the Narrative of Rural Sage and Significance of Guan Renshan's Novels

Yang Chaogao

Abstract: Among contemporary writers, Guan Renshan is the one who has made the most efforts to write about rural sages. Through a series of novels, he has rewritten the narrative paradigm of squires and rural sage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reshaping a group of well-rounded images of contemporary rural sages. Moreover, he has reconstructed the contemporary culture of rural sage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 the cultural tradition. In the process of reshaping and reconstructing, we can see the writer's standard for the rural sage and rural attitude. Whether to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or to literature itself, the narrative of rural sage of Guan Renshan's novel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Keywords: Guan Renshan; the image of rural sage; rural sage culture; *High Heaven and Deep Earth*; *The Sun*; *The River of Wheat*

[1]关仁山:《给生命来点幽默》,〔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41页。